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三四期 ——
(二〇〇三年四月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304a)

【史实辨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66—1982)》

若干史实辨证

张志明

【史海钩沉】“全红总”始末

李伯特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实辨证】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66—1982)》若干史实辨证

• 张志明 •

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但是，书中有不少观点也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特别是该书在史料运用方面存在不少失实之处，一些不准确的或错误的史料直接导致了错误的判断。因此，对这部著作中的若干史实进行辨证是必要的，也是有价值的。本文仅就此书1966—1982年卷中有关部份史实方面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就教于该书作者，也供海内外学者参考（文中所注页码均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该书英文版本为准）。

（一）关于罗瑞卿被打倒问题

“就人民解放军而言，中国对日益升级的越南冲突应作何反应的争论，为清洗总参谋长罗瑞卿提供了机会，而罗是能够向林彪对军队的控制力提出挑战的潜在对手。”（见第123页）

打倒罗瑞卿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引起强烈震动的重要事件之一，也是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由之一，曾引起各种议论和猜测，上引《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者的看法，也曾是其中猜测之一。但经过30年的历史沉淀和研究，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之后，有关林彪集

团的诸多研究，已使历史真相得以澄清。导致罗瑞卿被打倒的原因，并不是军队领导人对越南冲突战略的争论，而是林彪、叶群的阴谋陷害和毛泽东对诬告的轻信。邓小平在1978年8月12日罗瑞卿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时，明确肯定：“罗瑞卿同志是大家熟知的同林彪反党集团坚决斗争的英勇战士，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当时强加在罗瑞卿身上的罪状主要是两条：一是“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二是有野心，要夺林彪的权。这两条都是站不住脚的诬陷。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中共中央于1980年5月20日为罗瑞卿平反的决定中，也已予以澄清。

罗瑞卿当时确实是主管军队的实权人物，一人身兼多项要职，包括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他本是老红军，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建国后转到公安战线，长期任公安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后亲自提名让罗瑞卿从公安部调回军队任总参谋长，说明林彪对这位长期共事的老部下是十分信任的。那么，后来林彪为什么又煞费心机要打倒罗瑞卿呢？理由并不像林彪在著名的“五一八讲话”中冠冕堂皇讲的，是什么“罗瑞卿是掌军权的”，“能搞反革命政变”，“要篡夺政权”，因此，打倒他是“制止反革命颠覆的措施”。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不肯为林彪所用，抵制了林彪的某些非组织活动，以至于被林彪视为实现其完全控制军队野心的巨大障碍。使林彪特别不能容忍罗瑞卿的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林彪身体一直不好，经常离京到外地养病，所以，有些紧急事情罗瑞卿就没有通过林彪而直接向毛泽东请示汇报，林彪对此耿耿于怀。二是因为工作关系，罗瑞卿同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贺龙元帅接触较多，而在林彪看来，贺龙是人民解放军中另一山头的代表，不利于自己对军队的控制，因而引起林彪猜忌，认为是罗瑞卿对他“不忠”、“不敬”。三是罗瑞卿对林彪的夫人，也是林的办公室主任叶群非常反感，认为这个女人“浑身都是假”，对她的飞扬跋扈、无理取闹从不认账，招致叶群的憎恨。于是，林彪和叶群就编造了种种理由，搜罗了一些伪证，骗取了毛泽东的支持，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打倒了罗瑞卿。而这些，同对越南战争采取何种反应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

（二）关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最后在1966年的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人数不全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刚过半数。”（见第124页）

如果这里是指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无疑是正确的。但从时间上看，这是指的1966年8月1—12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会议尽管是在“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发动，不少领导干部受冲击的极端紧张的不正常的气氛中召开的，但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人数却不是刚过半数，而是141人。其中，中央委员74人，比“八大”选出的97人少23人；而候补中央委员67人，比“八大”选出的73人只少6人，占“八大”选出的总人数180人（原文如此，应为170人——编者）的78.3%，远远超过半数。如果考虑到自“八大”以来已有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去世，还有几位因病因故不能出席，那么应该说是到会人数相当多的一次。这次中央全会的特点不是人数少，而是比正常的中央全会多了一些人，这就是非中委的中央文革成员江青、张春桥、关锋、王力、姚文元等，还有些所谓首都高等院校师生的代表，如聂元梓等。这些列席代表多达47人。

（三）关于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

“在处理吴晗及其《海瑞罢官》一剧的问题上，毛使用了一把双刃剑。一开始他把批判吴晗剧本的任务交给了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该组织成立于1964年。这一举动将彭

真置于极为困难的境地”。（见第127页）

根据到目前为止我们所了解的史实，这段叙述中有三点是不够准确的。

首先，毛泽东并没有把批判吴晗的任务交给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因此，说不上是毛泽东对彭真的考验，即所谓“双刃剑”。

其次，也很难说这一任务是毛泽东交给江青的，说它是由江青、张春桥等蓄意策划的阴谋，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本来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撰写《海瑞罢官》一剧，是想贯彻毛泽东在1959年上海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的。所以，1962年当江青第一次向毛泽东提出此剧有问题时，毛泽东并未理睬。1964年康生再次向毛泽东说，此剧与1959年庐山会议有关，与彭德怀问题有关时，毛泽东仍未接受，只是后来才被这些人“说服了”。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67年2月同阿尔巴尼亚外宾卡博和巴卢库谈话时提到说：“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江青则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江青开始在北京组织人写批判文章，无人愿写。她便到上海，在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协助下，秘密地开始了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写作。多次易稿，后经毛泽东审定，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题目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

第三，彭真自始至终对这篇文章的背景一无所知。文章发表后，他并没有立即作出反应，而且还让中宣部的人去了解文章的背景。新华社没有立即播发姚文元文章，北京的各大报纸当时也未予转载，以致毛泽东下令上海出姚文元文章的小册子，而北京一本也不订购。此事成为认定彭真在北京搞“独立王国”的罪证之一。这些也从另一角度证明，毛泽东没有交给彭真批判吴晗的任务。

不过，“这一举动将彭真置于极为困难的境地”倒是真的。就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前后，毛泽东曾几次当面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虽然尽力辩解，说明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但不仅未能保护吴晗，反而加深了毛泽东对北京市委的误断。以致在后来毛泽东亲自审改同意的林彪向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毛主席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批判《海瑞罢官》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总战略的一个举措，是一柄多刃剑。

（四）关于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至此，两个主要的目标——罗瑞卿和彭真——的最后命运在5月4—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最后决定了。这次会议最重要的部份是林彪的即席发言，其主要材料据后来指控是由张春桥提供的”。（见第131页）

这里也有几点是不够准确的。首先是会议时间。党的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是1966年5月4—26日在北京召开的，而不是5月4日至5月18日。

其次，会议上被批判的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四个人，会议对罗瑞卿和彭真的所谓“最后命运”的“最后决定”也就是决定对四人进行专案审查，是于5月23日才作出的。如果5月18日会议就结束了，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决定了。

再次，给这次会议定下基调的确实是林彪5月18日的讲话，即后来大家所称的“政变经”。

不过这篇讲话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并非“即席发言”。说这篇“政变经”的主要材料是由张春桥提供的，似不符合事实。张春桥当时在上海一直忙着帮助江青搞大批判，组织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和起草《五一六通知》。不可能由张春桥来给林彪提供这些历史上的政变材料。在后来审判“四人帮”的资料中也没有发现对张春桥这方面的指控。事实上，林彪这篇连毛泽东后来都对他关于政变的一些提法感到不安的“政变经”，是他个人的一个别有用心心的“创造”，他所引用的古今中外的政变材料，都是以学习历史的名义指使一些人为他搜集的。而搜集这些材料的人中据了解并没有张春桥。

（五）关于清华大学工作组和王光美

“更为针锋相对之处在于派往清华工作组的领导人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见第137页）

在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烈焰之后，在全国各地首先是北京的许多大、中学校掀起了“造反”浪潮，致使学校的领导工作陷于瘫痪。因为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中共中央在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下，决定采取传统的做法，由上而下按管理系统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其中派往清华大学工作组的负责人不是王光美，而是曾做过周恩来秘书，当时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叶林。王光美开始并没有参加清华大学工作组。6月19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提出要赶走以叶林为组长的工作组。也正是这一天刘少奇委托王光美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6月21日，王光美被派参加工作组，成为引人注目的成员。在她的授意下，清华大学工作组领导开展了“反干扰”运动，批判了蒯大富等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光美是工作组的领导人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并不准确。因为在事实上王光美并没有过工作组“领导人”的任命和头衔。

（六）关于红卫兵和“红五类”

“起初，中央的政策只准许出身于‘红五类’——工人、农民、士兵、干部和革命烈士——家庭的学生加入红卫兵组织，并且禁止‘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参加红卫兵运动”。（见第149页）

“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组织自始至终都是以大、中学生为主的一种自发性的群众组织，无论地方或是全国都没有统一的规划、统一的领导和统一的组织系统。它一开始就完全脱离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是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产物。但它实际上又一直被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着“中央文革”的旗号所操纵和利用。中共中央当时并没有对有关如何组织红卫兵和对参加红卫兵组织的成员出身等问题作过政策性的规定。但是，由于长期的阶级教育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极“左”氛围，在以阶级性纯洁为荣的历史条件下，红卫兵组织自己从诞生伊始都规定，只有“红五类”才能加入，才有资格当毛主席的“红色卫兵”。而一些所谓“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历史不清”的人是不能当红卫兵的。这在当时是一种通行的不成文法。但并没有禁止“红五类”以外的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和某些红卫兵组织的活动的规定。因为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跟随红卫兵活动也是革命的象征。于是，这些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的青年学生也积极地和红卫兵一起去扫“四旧”、贴大字报……，这些人在当时被称作“红外围”。

（七）关于陶铸问题

“快到年底时，陶铸因为企图保护省委、中宣部及文化界的干部免遭批判，以及据说要剥夺中央文革小组对这场运动的控制权而被撤销宣传部部长职务”。（见第152页）

首先，陶铸被打倒的时间不是快到1966年年底的时候，而是1967年的年初，即1967年1月4日。这一天在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煽动下，公开张贴出“打倒全国最大保皇派陶铸”等大标语，此后，陶铸即丧失了工作权力和人身自由。

其次，陶铸这天突然被打倒的原因比较复杂。当时他虽然是第四号人物，但不可能也不会是企图去“剥夺中央文革小组对这场运动的控制权”。因为中央文革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掌握和指挥下，是贯彻毛泽东战略部署的重要机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剥夺”中央文革的控制权实际上就是向毛泽东夺权。这是当时的任何领导人都不敢想也不会去做的事。实际情况是，陶铸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同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有分歧，发生过多次争吵，甚至和江青当面顶撞。陈云在1978年12月24日陶铸追悼会上致悼词时讲得很清楚：陶铸是因为抵制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积极保护老干部和革命群众，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成为林彪、“四人帮”篡党窃国的障碍”，才被“四人帮”采取突然袭击的卑鄙手段，捏造罪名，把陶铸打倒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陶铸的夫人曾志在《往事如烟难忘却》一文中有比较真实而详细的说明，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另外，陶铸当时实际上被撤销的主要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的中宣部早已停止工作，属于毛泽东决定要撤销的单位，因此，中宣部部长并不是他的主要职务。另外，本书第601页说陶铸于1966年“被捕死于狱中”也与史实有出入。据徐子芳《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记述，陶铸不是1966年被捕死于狱中的，他死于1969年11月30日，是在合肥的解放军某部医院。

（八）关于上海1月6日的大会

“1967年1月6日的上海群众集会正式肯定了所发生的事实，撤销了曹获秋及上海市其他官员的职务。同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张春桥由北京回到上海，以建立一个新的市政府，取代已被推翻的市委。”（见第159页）

1967年1月6日在上海召开过一次名为“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获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并且发出通令，宣布不再承认曹获秋为上海市市长，并且要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不过这还只是群众大会上发出的一种要求，还不能成为权威性的命令。事实上也没有中央发出或批准的撤销曹获秋市长和改组中共上海市委的正式文件。根据已经发表的有关材料，这次大会并不是群众的自发行动，而是由张春桥、姚文元及其在上海的党羽王洪文、徐景贤等一手策划的。在大会正式开始的前两天，即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就乘飞机从北京赶回上海，并非大会的“同日”，他们的目的就是利用其一手策划组织的康平路事件所造成的大动乱局面，进行乱中夺权，回上海摘“熟了的桃子”。1月6日大会是他们夺取整个上海市党政财务大权的一个重要步骤。会后，8日建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张春桥称它为“经济苏维埃”，实际上取代了市政府。随后又建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代替了公安局和法院。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全市的实际权力逐步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手里。但是，全市的正式新政权机构并没有能够很快建立起来。2月5日，即上述夺权大会召开的一个月之后，上海人民公社才正式宣告成立，它是新政权建立的标志。2月24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九）关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变化

“8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被改组。其中最激进的4名成员——王力、穆欣、林杰和关锋——被免除职务。”（见第183页）

中央文革小组是于1966年5月28日宣布成立的一个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机构，其成员共有18人。按照当时中共中央文件的通知，他们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成员确定后另行通知。这4名成员后确定为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以上合计为17人。后又任命陶铸为顾问合为18人。其中从来没有过林杰。据了解，林杰是红旗杂志社的编辑，“文革”开始后曾是中央文革小组中较有知名度的一位工作人员。这个人员组成很快就发生很大变动。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组员谢镗忠、尹达、郑季翘、郭影秋、杨植霖、刘文珍和顾问陶铸陆续被排除，到成立一周年时，就只剩下陈伯达、康生、江青等9人。为要说清书中谈到的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所谓“改组”问题，这是需要先弄清楚。书中谈到的在1967年8月中央文革小组经历过一次人员变动确实是发生过，不过谈不上是改组。而且讲的情节和涉及成员也不够准确。首先，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在1967年8月下旬所发生的重大人事变动问题，在中国通称为“王关戚”事件。关于这一事件已经发表过不少文章和著述。特别是亲自参与其事的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书中列名的穆欣，在自己的回忆录《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57—1967）》一书中也有详细的记述。这一事件的大体经过是：1967年7月和8月，“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了连毛泽东都无法驾驭的“天下大乱，全局失控”的危险局面。正当毛泽东和周恩来想方设法力图稳住局势的时候，林彪、江青一伙则唯恐天下不乱地挑起了新的“内战”。他们指使红卫兵批判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公然鼓吹“揪军内一小撮。”8月7日，王力发表煽动夺外交部大权的讲话，在外交方面接连制造事端，以致发生火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这样建国后从未有过的恶性外交事故，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这一切使全国局势更加混乱。毛泽东在上海看到《红旗》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曾批示它是“大毒草”。负责外交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和整个局势的极端严重性报告了毛泽东，敦促他下决心采取断然措施，结束这种严重的动乱局面。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对王力、关锋、戚本禹隔离审查（稍后又决定对戚本禹暂缓处理）并责成周恩来严肃处理。8月30日晚，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这次变动确实是自发动“文革”以来对日益不可一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重大打击。1968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中央文革小组已从原来的18人剩下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5个人了。

最后，把王力、关锋、穆欣、林杰四人统称为中央文革小组中最激进的4名成员也是不准确的。激进一词是西方学者的通常用法，按我们习惯的定性则应称为极“左”派。林杰的情况前已述及，他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文革小组最激进的成员之说了。王力和关锋确实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最激进的成员，是江青、康生、陈伯达推行极“左”路线的得力干将。至于穆欣则根本不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最激进的成员。穆欣在“文革”前长期担任《光明日报》社党组书记，副总编辑。“文革”开始后，他被指定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6年6月初旬，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和《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在“文革”伊始，按穆欣在《十年自述》中的话说，他是“在迷惘与惶惑中跟着走”。但后来逐渐看透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阴谋伎俩，“对《红旗》杂志的事，始终采取不沾边的态度”。在中央文革小组，除掉在工作上奉令而做的那些事情以外，在私人关系上一般采取不接触的态度。在内心深处也陷入极度痛苦之中，他打比喻说当时的心情：面对全国混战，两军对垒，自己爬伏在交战双方之间的一片开阔地里，任凭双方互射的炮火在头上横飞，只能静静地伏在那里，走也走不开，动也不能动，不知道拖延到何时才能解脱？1967年7月间，穆欣为他的弟弟杜保同向中央转送过七机部四院一派群众组织“新红联”外调组关于蒋匪军委第六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情况调查材料，其中涉及林彪的夫人叶群（当时名叶宜敬）。原在这个训练班担任教官的欧阳敏纳给林彪写信，说有人调查叶群在“青训班”的历史。林彪对此极为不满，派人追查。结果发现杜保同是经过穆欣转送这份材料的，于是认定穆欣是“黑手”。1967年9月7日，江青与谢富治下令将穆欣关押到北京卫戍区，穆欣从此失去行动自由。1968年1月13日，穆欣被押送到秦

城监狱，监禁长达八年之久，直到1979年12月15日，才予以彻底平反。穆欣从中央文革小组中被清除，时间上早于王力、关锋，涉及的事情和性质也完全不同，不应混为一谈。

（十）关于“五一六事件”牺牲品问题

“五一六事件的全部五个牺牲品显然都是陈直接控制下的《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见第185页）

这里有三点是需要与作者商榷澄清的。首先，这里所说的“五个牺牲品”作者是指1967年8月至1968年1月中央文革小组发生重大变动中“被撤销职务”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和林杰，把这五个人笼统地放在同一罪名下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首先，对“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已经判明，当时在全国开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是错误的、无的放矢的。其次，王力、关锋、戚本禹被隔离审查以及穆欣被监禁的原因我们在上边已经谈过，都不是因为他们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后台操纵者。林杰更无从谈起。所以，不应当把他们五人说成是“五一六”事件的牺牲品。本书作者在这里这样说，可能是因为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过程中，确实有文件把这时已被审查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列入了“五一六”黑后台的名单之中，而穆欣在秦城监狱也被定为《光明日报》社“五一六”分子的黑后台。而这些是不足为凭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竟也被定为“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九一三”事件后，连林彪也被称为“五一六”集团的总后台。这只能说是中国当时在极“左”的狂热支配下人为地随意制造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现象，而绝不能成为历史的真实。我们总不能因此说陈伯达、林彪也是“五一六”事件的牺牲品吧。第三，说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林杰都是《红旗》杂志的副总编也不确，据了解，林杰和戚本禹没有担任过这一职务。林杰只是《红旗》的一名编辑，而不是副总编。戚本禹在“文革”前是《红旗》杂志的历史组组长，后调到中央办公厅任秘书局副局长，也没有任过《红旗》副总编。

（十一）关于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他于1966年写给江青的、表达对林彪的行为忧虑的信件，很快在党内公布”。（见第335—336页）书中对这段话作了如下注释，“在林彪死后，毛公布这封信如此方便，以至于文革结束后，中共党史学家似乎对它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为了回答这种怀疑，一位老历史学家回顾了以下一段情节：当林彪知道毛1966年的那封信后，他极为焦虑，以至于毛决定不将它公布，并且确实命令销毁它。但正要销毁时，“左”派宣传家戚本禹向周恩来抗议说，毛的话太珍贵了，不能用这种方式销毁；总理反复向他保证说，已命令那时的宣传部长陶铸复制一份。林彪摔死后，公布的是这个复印件的复制品，因此容易引起对有关真实性的怀疑。请参考谭宗级《教学参考》（下）中的描写，第41页”。（见第335—336页）

这段注释所引谭宗级教授《教学参考》（下）中关于1966年毛泽东致江青信的描述与史实有些出入。根据目前我们所调查和了解到的情况，这封信的经过是这样的：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给远在上海的江青写了一封内容深奥、文字隐晦的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更直接而集中的表述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和意图。其中谈到了对林彪“五一八讲话”中有关政变提法的“不安”，认为林彪对他的颂扬之词是“吹”，“吹得神乎其神”，“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表达了“盛名之下”仍要严于解剖自己的愿望。毛泽东写信后，他的机要秘书徐业夫誊清了一份，毛泽东看后改了几个字，交徐业夫存档，而把原信寄给了江青。当时，周恩来正好陪外宾来武汉见毛泽东，期间，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了这封信。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不安后，表示自己愿意主动找林彪谈谈这件事。周恩来找林彪谈了这封信及毛泽东的不安后，林彪确实感到焦虑和

紧张，并表示以后不再那样讲了。江青后来让林彪看了毛泽东寄给她的那封信，为解除林彪的疑虑，江青当着林彪的面烧毁了该信。原件虽然已不存在，但徐业夫誊清并经毛泽东改过的信还在。因此，林彪摔死以后，在1972年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中央政治局作为会议的重要文件印发这封信，当然就很方便了。这里不存在文件的历史真实性的问题。

（十二）关于迟群和谢静宜的职务问题

“该小组由前中央警卫团、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政委迟群领导。迟群当时是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他的助手谢静宜，也来自8341部队，曾做过江青的秘书，后来调到清华大学担任革委会副主任。”（见第345页）

根据我们所掌握和调查了解的情况，这里有二点是需要澄清的。这里所讲的小组是指1968年7月中央派往清华大学的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过该小组负责人迟群不是8341部队的政委，他仅是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的副科长。江青曾经许愿让迟群当8341部队的副政委，但没有成为事实。其次，谢静宜在“文革”前是中央办公厅及8341部队的机要员，曾做过毛泽东机要文件的管理工作，可能同时也替江青管过文件之类，但没有做过江青的秘书。

（十三）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酝酿过程

“叶剑英又回到了他的故乡广东，在这里他与邓小平会了面，发现邓也做好了战斗准备；我们要么任人宰割，让党和国家蜕化变质，眼看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烈用热血换来的江山被这四个人毁，甘心历史倒退一百年，要么我们就与他们斗争到底，只要一息尚存。如果我们赢了，一切都迎刃而解；如果我们输了，只要活着，我们就上山打游击，或者我们也可以到国外找一块庇护地，以待时机。目前，我们可以用来与他们作斗争的力量至少有广州军区、福州军区、南京军区。如果再拖下去，连这一点本钱我们也会输掉。”（见第366页）

该书作者在这里所述的是1976年8月毛泽东病逝前夕，“四人帮”夺权活动日益猖獗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这里有二点是不符合史实的。叶剑英传记组组长、著名专家范硕将军对叶剑英元帅行踪的把握应该是有权威性的。据他所著《叶剑英在1976》一书所记载：第一，在1976年8月前后，叶剑英和邓小平都在北京，而没有到广州。叶剑英在1976年“四五”运动后不久，从城里搬到了西山15号楼，在粉碎“四人帮”之前他一直住在这里，并没有在8月份离京回到他的故乡广东。邓小平在1976年4月7日被再次打倒以后，一直被软禁在北京，也从未到过广州；第二，叶剑英在1976年8月前后没有也不可能与邓小平会面并商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叶剑英起初悄悄地去看望他，以后不能再亲自去了，就时常让子女去探望。因为当时邓小平已被软禁，而叶剑英早在2月3日中央一号文件中被宣布因“生病”而不再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自身处境也很艰难。他们二人在毛泽东病逝前夕并没有会过面，邓小平更没有向叶剑英讲过如何同“四人帮”斗争到底的话。但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这里所引用的加赛德《活跃起来！》一书中邓小平说的与“四人帮”斗争的话，同在周恩来治丧期间，叶剑英与邓小平会面时的谈话有些类似。据《叶剑英在1976年》一书中的记载，在1976年1月，叶剑英同邓小平曾有如下一次对话：叶剑英说：这伙人欺人太甚，步步进逼，他们趁总理去世，主席有病，越闹越厉害，下一步还不知搞出什么鬼名堂，我们要赶快采取对策！邓小平说：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坏是罗迈下场！我这个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但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后继有人。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我不在位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师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叶剑英说：看形势的发展吧，我也可能保不住了。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斗下去！邓

小平说：不过，要讲究斗争方法，这是总理临终前嘱咐。作者是否把这次叶邓的谈话，时间弄错移后了？

（十四）革命委员会是否经过民主选举问题

“很多权力落到群众组织手中，因为革命委员会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见第 5 5 2 页）

这里有二点是需要与该书作者商榷的。首先，说革命委员会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这或者是传闻的失误，或者是出于西方某些思维逻辑推演而产生的误解，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其实，革命委员会不过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由局部夺权发展到“全面夺权”，直至全局失控的严峻情势下，历尽磨难后才在中央的直接控制与指导下，靠军队支“左”与多种力量的平衡而建立起来的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原设想通过大批判促进“大联合”，然后实现“三结合”来建立革命委员会，但实践与设想并不一致。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之后，结果是越批越对立，越促越混乱，群众组织之间派别林立、武斗泛滥，闹得不共戴天，根本就不可能按行业和系统形成统一的组织或“代表大会”，根本无法实现什么“大联合”，更别说“民主选举”了。按公认的一些准则，民主选举需要有公正的无歧视的选民登记；公开的平等的竞选和自由无压力的投票等，以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选择权力。而这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与其说革命委员会是“民主选举”的产物，勿宁说它是所谓“大民主”的产物。这种“大民主”的具体形式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串联”，它从“文革”一开始就是对民主和法制的践踏，是对公民权利的任意破坏，是一场无法无天的社会大浩劫，它不仅不能实现任何意义上的民主，而且连公民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和生存权力都无法保障，只能走向民主的反动；不仅不能实现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而只能使中国社会走向大分裂、大动乱。“大民主”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更是造成了沉重的灾难。

其次，革命委员会建立后，并没有使“很多权力落到群众组织手中”，毛泽东开始也希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能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成为具有崭新的革命作风和有利于人民的制度，所谓“既当官，又当老百姓”。而体现这一切的依据便是“三结合”中有所谓“革命群众”的代表，也就是有各个“造反派”的负责人参加，认为这些人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对各级政权机关可以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这就保证了各级领导永远和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事实上，这些所谓的“群众代表”根本不可能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即便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某一部份群众的利益，但在高度集权的革命委员会决策机制中，也主要是“三结合”中担任主要负责人的军队干部说了算。据统计，担任县以上各级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军队干部，全国共有 4 8 0 0 0 人。其中担任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的共 2 0 名，占 6 9 %，担任县以上各级革委会主任的一般在 8 0 % 以上。例如北京市占 7 8 %，广东省占 8 1 %，辽宁省占 8 4 %，云南省占 9 7 %，湖北省占 9 8 % 等。所以“群众代表”实际上起不到很大作用。后来，随着省以下各级党委的重建工作的完成，这些“革命群众”的代表在新一届革委会中的比例已大大下降，并且在常委中的比例更小，基本上都没有担任什么重要职务，他们不可能有多少权力。

（十五）关于邓拓之死

“邓拓 1 9 6 6 年 5 月在被捕后不久即被杀害（也有人说是自杀）。”（见第 6 0 0 页）

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事实真相是 1 9 6 6 年 5 月 1 7 日夜晩，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在自己家中自杀身亡。邓拓死前并未被捕入狱过。所谓“被捕后不久即被杀害（或自杀）”的说法是不确的。他是在经过 1 9 6 6 年 5 月上旬对“三家村”和《北京日报》的批判，自己被莫须有地诬陷为“叛徒”，北京市委已陷于风雨飘摇境地的一系列无情打击之后，怀着悲壮的复杂心情，毅然决定以死抗争的。死前，邓拓在家里给北京市委领导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党和人民

的忠诚；给家人也写了一封信，要求子女永远跟共产党走。有关邓拓自杀的情况，他的夫人丁一岚所写《忆邓拓》，他的儿子邓云所写《回忆我的爸爸邓拓》等文章中都有记述。两文均载《忆邓拓》一书。海外的某些谣传是不可信的。

（十六）关于四清运动

“因而，在社教运动的第一阶段，中共发起了一场‘四清运动’，以清理农村干部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经营管理方面的错误。然而，要清除的主要问题仍是经济方面的”。（见第565—566页）

这里似有二方面的问题需要澄清。第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阶段的内容是不同的。第一个阶段是从1963年2月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在城市开展以“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到1964年底；第二个阶段是从1965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主持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开始到1966年春，这个阶段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称为“四清”运动。在社教运动的第一阶段，“四清”仅限于农村，内容是根据河北省保定地区的经验总结的，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后来这被称为“小四清”。而第二阶段，社教运动就叫“四清”运动，而这时的“四清”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作者可能将两个不同阶段的“四清”运动及其内容混淆了。

第二，说社教运动的第一阶段在农村进行的“四清”运动所要清除的主要问题仍是经济方面的，也有待商榷。毛泽东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天天讲”理论的重大战略部署，它从一开始就有着在中国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的明确目的。虽然一开始在农村进行“四清”的内容是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从字面上看似乎所清除的主要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虽然“四清”对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缺点，也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毛泽东提出在农村搞“四清”，其根本出发点和着重点并不在这里。在毛泽东看来，清理经济问题只是运动的着手处和突破口，他最关心的一点是抓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正是由此出发才会逐步发展到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运动的重点。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发起农村“四清”运动的前后的多次谈话中都讲得很明确。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经验时，提出农村“四清”运动应当学习这些地方整风整社的经验，那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26日他对大区书记讲：贫下中农组织一定要搞好，在农村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会后他又说：如果我们不整风，那些县都要出修正主义。如果我们再不搞，再过10年，中国也会出修正主义。在1963年5月20日发布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10条》）这一指导社教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中，以及同年9月27日通过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10条》）中，都明确指出“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任务，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由此来看，说农村“四清”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防止和清除“修正主义”，是要清除党内的所谓“走资派”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史实是论断的基础，也是判断观点是否正确标准和依据。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们共勉。

□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 04

~~~~~

【史海钩沉】

## “全红总”始末

• 李伯特 •

我叫李伯特，原名萧碧璜，贵阳人，“全红总”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全红总”领袖周牧（又名郑天赐，现名方圆），是与我从小长大的至交。三十六年前（一九六六年），我担任了“全红总”西南区指挥部总指挥。以下的史实，都是自己亲身的经历和当事人的回忆。

### 一、两次静坐告捷

“全红总”的全称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成立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成立地点是北京西直门内大街西章胡同的冶金部招待所二楼二四三号房间。成立之初，安徽的杜某和无锡的季某被推选为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只不过，这两位“总指挥”和“副总指挥”都是挂名的。大家看重的只是他们共产党员的身份。

“全红总”实权掌握在总部秘书处。人们戏称秘书处为“书记处”，将“全红总”的秘书处类比中共中央书记处。北京王振海（国家科委情报所的临时资料员）当选为总部秘书处的秘书长，贵州的方圆（贵阳洛湾小学代课教师）缺席当选为副秘书长。湖南的罗运泉、廖阁夫，北京的郝维奇，安徽的慕纪群、慕纪雄当选为秘书处秘书。

秘书处的分工为：王振海、郝维奇负责筹建北京分团和对外联络。方圆负责筹建贵州及各外省分团，兼管理论和组织工作。罗运泉、廖阁夫负责与中央各级机关的联络工作。慕纪群、慕纪雄负责内部的总务工作。

总部任命了组织部长杨政（长沙）、宣传部长龙云学（长沙）、联络部长裴燕柱（无锡）、接待部长张德明（贵阳），北京分团筹备组长李云臣（又名李卫兵，北京）。

“全红总”十一月八日宣告成立的当天，在罗运泉、廖阁夫带领下，首批成员五十多人到全国总工会八楼会议厅静坐，要求全国总工会承认“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王志杰等人并没有把“全红总”的这五十来号人放在眼里，根本不予理睬。因此，这一静坐，直坐到十一月十八日，人数则由五十多人增加到三百来人，每天来声援的群众达数千人。王志杰等人看十天来“全红总”的声势越来越大，不理睬不行了，连忙向全国总工会总书记马纯古、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报告，马纯古又向副总理李富春作了报告。李富春表态不要把事态扩大，要王志杰等在口头上表示支持“全红总”。

十一月十八日，王志杰代表全国总工会在口头上承认了“全红总”是合法的造反组织，“全红总”成立后的第一次斗争取得了胜利。

十二月一日，“全红总”第二次在全国总工会八楼会议厅静坐。参加这次静坐有“全红总”成员三百余人，目的是要求“全总”把对“全红总”的口头承认落实为合法注册，刊刻公章和拨给活动经费。

十二月六日，全总和劳动部党组负责人联名向李富春和中共中央送交了《关于如何解决临时工、合同工问题的请示报告》，提请中共中央重视“全红总”所领导的全国性的临时工合同工造反问题，指出临时合同工制度如不加改革的严重性。在当时的中央工交口会议上，李富春向周恩来作了关于“全红总”的汇报。周恩来表示应予正确疏导。

十二月八日，全国总工会经过李富春批准，终于正式为“全红总”刊刻了公章，办理了注册手续，并和“全红总”达成“会谈纪要”，决定和“全红总”确定研究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全红总”原来预计十天的第二次静坐斗争，实际静坐了八天就取得了胜利。

同时，继“全红总”全国总部十一月八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后，“全红总”的第一个地方分部——贵州分部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贵阳正式成立。

十二月五日，北京分团正式宣告成立。紧接着，“全红总”的四川分团，云南分团，湖南分团、湖北分团，广西分团、广东分团、江苏分团、浙江分团，上海分团、安徽分团、江西分团，河南分团，河北分团、内蒙分团、黑龙江分团、吉林分团、辽宁分团等等相继在各地成立。

## 二、第一次总部改组

十二月十日，“全红总”召开总部扩大会议。会上，罗运泉提出成立“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会议筹备组”。任总指挥的杜某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原来一个秘书处的集体领导已经把他架空，现在再成立一个会议筹备组，将置他于何地？他的意见被否决后，杜某某和慕家兄弟及裴燕柱四人宣告退出“全红总”。

杜某某等人退出后，“全红总”不得不立即进行改组，这是“全红总”的第一次改组。这次改组重新选举了领导班子——“五人小组”（对外称秘书组），宣布一切权力归“五人小组”。

“五人小组”由王振海（北京）、方圆（贵州）、罗运泉（湖南）、廖阁夫（湖南）、郝维奇（北京）组成。分工是王振海负责北京分团，方圆负责理论和日常事务的处理，罗运泉、廖阁夫负责对上联络，郝维奇负责对其它群众组织的联络和科委系统的“全红总”分支组织的组建。

“五人小组”任命了毛胜年（贵州）任组织兼内务组长，杨政（湖南）任保卫组长，唐静（吉林，女）任宣传组长，韩琳（陕西，女）任联络组长，张德明（贵州）任接待组长，王振海兼任北京分团团长。

## 三、最后通牒与封闭劳动部

总部改组后，从十二月十日开始，罗运泉、廖阁夫天天去找全总和劳动部的负责人，希望他们早日开始会谈，讨论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但这些负责人总是一拖再拖，迟迟不确定举行会谈的日期。

到了十二月二十日，年关将近，各地临时合同工受迫害的投诉电报、信件日益增多，而且情况越来越紧急，越来越严重。

十二月二十日全红总召开总部扩大会议，责成罗、廖二人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作最后交涉，要求他们在二十三日确定三方会谈日期。罗、廖二人结束会议后立即赶到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向他们提出了最后通牒。

十二月二十二日，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共同答复“全红总”，确定三方会谈订于次日在劳动部礼堂召开。但两次延期，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会谈都无法举行。最后确定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召开。

这两次延期引起所有总部委员的愤怒。为此“全红总”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召开了总部会议，并作出决议：如果十二月二十五日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再拖延日期，就在当天先把劳动部封闭，十二月二十六日再把全国总工会封闭。

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会议作了如下安排：

一、王振海立即到北京分团，动员北京分团全体团员处于紧急待命状态，动员人数不得少于五万人。

二、总部委员分成两部份——一部份由王振海、方圆、杨政带领，实施北京分团封闭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行动。另一部份由罗运泉、廖阁夫、郝维奇带领，先期进入全国总工会维持全国总工会的秩序和现状，准备迎接大队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封闭全国总工会。

三、拟定这次行动的口号：

- (1)向刘老板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 (2)彻底铲除一切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
- (3)我们要革命，要生产，要吃饭！
- (4)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罗运泉、廖阁夫打电话给主持总部日常工作的方圆：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又决定在二十五日召开的会议无限期推延。他们说，劳动部和全总的负责人说元旦将近，过了新年再说吧。

方圆接到电话后，通知总部委员们根据昨天的决议进入自己的位置。同时通知王振海，要他在下午两点前把人马带进天安门广场，两点正准时进行动员。

二十五日下午两点，北京分团来了五万多人，把金水桥的两侧都站满了。两点正，王振海在一辆宣传车上讲话，布置了今天的行动。在王振海讲话的时候，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长安街的交通终于中断了。人群一直站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王振海讲话结束后，队伍在宣传车的带领下徐徐移动。方圆与杨政率领纠察队三百余人乘坐几辆大客车，先行到达劳动部。在劳动部的造反组织的配合和带领下，迅速封闭了劳动部除礼堂、二楼会客室和总机房外的一切办公室。

王振海带领的大队大约在下午五点左右到达，把劳动部围得水泄不通。王振海再次通过劳动部的广播系统发表谈话，宣读声明，宣布纪律，直到八九点钟，队伍才慢慢散去。

四、江青接见和进驻全国总工会

二十五日晚深夜十二点左右，几位纠察队员忽然带着两名军人进入劳动部会客室。他们一进门就要找王振海和方圆。那几位纠察队员颇为紧张，担心军方进行干预，或直接来逮捕王振海等。所以，叫来几十位纠察队员把大门封住。这两位军人看着他们惊疑满面、准备拼命的样子笑起来了，连声说：“请不要误会！我们是中央文革的联络员，是奉中央文革的命令来支持你们的！”

其中一位戴眼镜的军人，自我介绍是“解放军报”的编辑，名叫邵一海。他把方圆叫到一

旁，压低声音说：“毛主席七十三寿辰的晚上（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中央文革首长要接见你们。为了首长的安全，你必须从现在起保密，绝对保密！希望你把总部人员的档案交给我们，便于中央审查和决定参加接见的人员，现在就走，好吗？”

方圆把情况悄悄告诉王振海后，乘坐邵一海等开来的一辆华沙牌小车回到总部，把所有总部委员的档案副本交给邵一海。

二十六日上午十时许，邵一海只身来到“全红总”，交给方圆一张打印好的名单，一共有十五人。他要方圆秘密通知这十五个人，晚上七点前在西什库儿童工读学校右侧的街口等待，在七点正会有一辆车前亮着三盏红灯的草绿色大客车来接载。

当天晚上七点钟，这辆大客车如约准时到达。上车后，车子先开到平安里《解放军报》社大院内停下，然后上来两位军人。邵一海介绍，这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人民日报》代总编唐平铸和《解放军报》副总编胡痴。在大家的掌声中车子开动，直奔向人民大会堂东门，进入东会议厅。

坐下片刻，正当时针指到七点五十八分时，江青率领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进入东会议厅。

江青坐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这次接见从当天晚上七点五十八分开始直至次日凌晨零点三十四分为止，长达四小时三十六分。

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全红总”代表的发言和江青等和劳动部两个副部长酆占元、李正亭及全国总工会书记王志杰的问答，其余的约三分之二的 시간은江青讲话和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的插话。江青讲话长达两至三小时。

方圆和唐静、邵一海都作了记录。方圆的记录经过邵一海的大量删节后，连夜交《工人日报》铅印，第二天发往全国。

在这次接见中，江青当场要“全红总”代表拟一个以中央文革名义发出的通知。这个通知当即由我草拟并交给江青过目。内容是：

一、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

二、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解雇合同工、临时工，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三、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被打成反革命的合同工、临时工。应宣布立即平反，赔偿损失。

江青接过我拟的这个“三条”，和陈伯达、康生交换看过后说：“我建议修改一下。其中第三条在‘十六条’中和中央军委的平反命令中已经提到了，不必再提。我听说合同工队伍中有不少地富反坏右分子，除了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也要给他们一碗饭吃，我看这样修改好不好？——”

接着，她念了她亲手修改的“三条”。其中一、二条不动，只是第三条作了如下改动：“现行反革命分子除外”。在整理这份记录时，方圆感到这种提法不妥，打电话给江青，经她同意修

改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按十六条处理”。

在这次接见中，江青还要“全红总”办三件事：

一，开一个中型的控诉大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

二，拟出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上报中央。

三，到门头沟煤矿作一次调查，立即将材料交中央文革。

接见结束时，江青给方圆留下她的电话，并指定唐平铸、胡痴、邵一海作联络员。

江青接见后的次日——十二月二十七日，全国总工会派出数辆大小汽车，把“全红总”接进全总大楼，从这天开始，全总陷入瘫痪，“全红总”主持了原全总的一切工作，完全取代了“全总”，直到“全红总”被取缔。

## 五、第二次总部改组

在二十六日晚江青接见“全红总”的会议上，江青给“全红总”的十五名代表介绍了一位新朋友——李晋晔。李晋晔是中央广播电台对内部的临时雇员。因江青直接插手中央广播局的运动，所以颇为器重李晋晔。当天的会议上，江青推荐李晋晔加入“全红总”。李晋晔也表示从此中央广播局的“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成为“全红总”的一部分。

十二月二十七日，“全红总”召开总部会议，讨论总部工作正规化和李晋晔等的职务安排问题。会上，许多未获江青接见的总部委员把一腔怒火发泄到两个无辜的人身上——罗运泉、廖阁夫成了众矢之的。因为他们分管对上联络工作，绝大多数总部委员，认为他们办事不和大家商量，“搞修正主义”，所以，由唐静等四十人联合提出动议，要求改组总部。

这样，会议突然转向，成为“全红总”的第二次改组。在改组中，大家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重新选举了“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按得票多少的顺序，有以下五人当选：方圆（贵州）、王振海（北京）、李晋晔（北京）、金展云（北京）、郝维奇（北京）。改组后的“五人小组”是这样分工的：王振海掌握全盘，方圆主持日常工作兼管理论、组织。李晋晔专司和中央文革联络和兼管广播系统的分支组织。金展云专管国际联络（外交）。郝维奇专管对内联络和北京分团。

进入“五人小组”的金展云不是合同工，而是中央广播电台对外部的波兰语组翻译。他的背景是中央广播局当时掌权的“三人小组”负责人之一的李敦白。文革中江青派王力接管中央广播局，成立“三人小组”，王力任组长，李敦白任副组长。以后李敦白被打成“美国间谍”，关押至七八年才被释放。

由方圆提名，会议批准了以下职务变动：杨政（湖南）任保卫部长，余云庆（湖南）任组织部长，毛胜年（贵州）任内务部长，张德明（贵州）任接待部长，唐静（吉林，女）任宣传部长，韩琳（陕西，女）任财务部长，李宝城（黑龙江）任联络部长。

首都三司的史学忠等则是不请自来，毛遂自荐协助“全红总”筹备大会，他们和江青、周恩来都有密切联系，和周的联系超过和江的联系。

至于身为中央文革联络员的邵一海，从十二月二十七日开始，更是公开坐镇“全红总”指

手划脚，发号施令了。

## 六、“三家联合通告”

十二月二十九日，邵一海把方圆和杨政叫到专门给邵一海使用的全总大楼四一六号办公室。

邵一海当时表情沉重地告诉这两位“全红总”最年轻的领袖：十二月二十六日江青的“三条”在常委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没有通过。常委中阻力很大。方圆问邵一海：“刘邓不是垮了吗？彭真不是倒了吗？为什么还有人给毛主席唱反调？”

邵一海沉默片刻说：“彭真是倒了。但刘邓不是那么容易垮的。前段时期陶铸不是暗中还在保刘邓吗？路线斗争错综复杂。就是刘邓陶全部都垮了，阻力仍然存在。不然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干啥？”

方圆问：“阻力是否来自国务院？”

邵一海听后深深望了方圆一眼，猛吸香烟。政治经验老道的邵一海用默认的方法想把矛头引向周恩来。

杨政则直接提出：“既然总理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炮打总理！”

邵一海一听，眼睛都睁大了。他说：“炮打总理，你们有这个胆量吗？”

邵一海对方圆与杨政说：“你们要多动一下脑筋。克服阻力要想办法，蛮干是要吃大亏的。你们可以和大家商量，集思广益，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配合中央文革的下一步行动。”

为了“配合中央文革的下一步行动”，“全红总”的领袖们认为，应该把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找来，通过正常的程序，共同签发一个有行政效力的文件，做一两件扎扎实实的事情，更有利于临时合同工。

六七年元月一日，王振海通知劳动部两个副部长郝占元、李正亭和全总党组负责人王志杰，当晚到达全总大楼会议厅共同拟定和签署《三家联合通告》。

《三家联合通告》由方圆草拟，全文如下：

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

1、为了保障“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

2、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

3、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

以上决定，通报全国。

郝占元、李正亭、王志杰三人当时非常配合。因此，《三家联合通告》迅速通过，并由王振



海代表“全红总”，李正亭代表劳动部，王志杰代表全国总工会签名并盖上鲜红的公章，在元月二日的凌晨送《工人日报》印刷厂，套红大字铅印，同时由邵一海向中央文革报告和由郝占元向国务院报告。

元月三日，邵一海告诉大家，中央文革认为这个文件很好，可以发往全国。但印刷厂因印刷量太大（三十万份），要等到五日才能印好。

元月五日未到，事情就出现惊人变化——元月四日一大早，邵一海气喘吁吁跑来找方圆，说中央文革决定缓发《三家联合通告》。方圆邵是何原因？邵也回答不出来，只是说“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叫缓发就缓发，你必须执行。”说完就匆匆走了。当天上午十点正，江青亲自打电话给方圆，要“全红总”缓发《三家联合通告》。方向江请示“缓发”原因，江只说了几个字：“现在发太被动”，就放下了电话。十一点，李晋晔接到戚本禹的电话，内容同样是缓发《三家联合通告》。

元月五日《三家联合通告》印好后，邵一海再次找到方圆和杨政，告诉他们，中央文革决定要销毁《三家联合通告》，原因是“有人借此向毛主席施加压力”，“中央文革不愿在此时把事情搞得下不了台”。在中央的压力下，这份通告被销毁。

这时，正值“全红总”西南区指挥部总指挥李伯特（当时名萧碧璜），来京汇报贵州分部情况。方圆把三份偷偷留下的《联合通告》交给他。告诉他中央文革已下令销毁。方圆对李伯特说，这是好不容易取得一点可给工人带来实惠的成果，眼看就要毁之一旦。

方圆还把毛周不和，江青出尔反尔的情况一一告诉李伯特，希望李伯特能珍藏这一历史的见证，如果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设法在边远地区印发，造成既成事实，使处境悲惨的临时合同工得到一点好处。李伯特表示，为了中国工人的利益，冒再大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为此，李伯特在北京仅仅停留一天，就匆匆南下。而这份《三家联合通告》在李伯特的努力下，终于在昆明大量印发，传播全国。

## 七、“国际记者招待会”

《三家联合通告》签署后的次日——一九六七年元月三日，金展云在“五人小组”碰头会上告诉大家，为了让国际上了解“全红总”，应该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五人小组”一致同意了金展云的提议，决定元月八日召开此会，并责成他和李敦白去筹备这个会议。关于会议名称，原订为“国际记者招待会”，但考虑到这个名称太敏感，改为“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

方圆把“全红总”的这一决定告诉了中央文革联络员邵一海。邵一海听后很吃惊，他告诉方：“对外交往是需要中央批准的，你们要特别小心，最好少和外国人打交道。这些外国朋友中混有别有用心的人。”邵一海说他立即报告中央文革，要等待中央文革同意再开会。

元月八日中午吃饭时，方圆告诉邵一海，中央文革到现在没有否定的指示，会议应该如期召开，希望邵能出席这个会议。邵一海听后脸色相当难看，情不自禁地念着：“胆大妄为，胆大妄为……”放下半碗没吃完的饭起身就走，也不和大家打一个招呼。这是邵一海第一次在众人面前生这样大的气。

元月八日晚八时，“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在西苑饭店会议厅召开。有一百多名各国外交官、驻京记者、左派组织驻京代表、援华专家参加。

会议由方圆主持，李敦白担任司仪和英文翻译。王振海代表“全红总”作了发言，其他的总部委员张宝成（辽宁代表）、余洪珠（贵州代表）等也介绍了本地区的临时合同工的遭遇。“全红总”的几位代表发言结束后，外国朋友纷纷提问，由王振海和方圆回答。会议进行到近十二点才结束。

当时，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记者近二十人到会采访。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全程摄影。会议结束后，记者们都来请示邵一海，关于会议的新闻发不发？只见邵一海黑着脸说了四个字：“一律不发！”，就匆匆走出了会场登车而去。

会后，周恩来与方圆通电话时批评：“你们就是不听话，不听打招呼。在外国人面前哭哭啼啼象什么话！家丑不可外扬嘛！你们这样做置中央于何地！”

## 八、神秘的周恩来遇刺事件

江青接见“全红总”时，指示开一个批判临时合同工制度的中型会议。这个会议原来准备在元月三日召开。协助“全红总”筹备会议的那伙首都三司的人，不知搞什么鬼，一拖再拖，拖到元月十六日才召开。

这伙人的头头有两名，一名是“地质东方红”的史学忠，一名是“清华井冈山”的宗祥荣。直到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元月十五日上午，史学忠突然把方圆拉到他的办公室，会见了已在其中等候的总理办公室的赵秘书。

赵秘书告诉方圆，周恩来明天（元月十六日）将出席大会，问方圆希望周恩来在大会上讲些什么？

方圆对赵秘书说：“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中能出席我们的大会，已经是对我们的极大支持了。我们希望在周总理不为难的情况下，对广大的临时合同工说几句关心他们疾苦的话，使他们看到改革临时工制度的希望。”赵秘书略为沉吟，立即用电话向周恩来请示后，把电话交给了方。

周在电话中对方说，“全红总”的要求是可以办到的，他一定会表示临时工合同工革命造反的大方向是对的，党中央是支持的。

周说，他有一个要求，希望“全红总”不折不扣地执行——就是大会要提出两个主要口号：一是“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另一个“抓革命，促生产。”

周说，要“全红总”通过这个大会做好来京临时合同工的工作，要他们立即离京返乡，减轻中央的压力，便于整顿北京的社会秩序。

他最后问方圆，“全红总”能不能办到？方圆回答他：能。周说他会和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来参加会议，要“全红总”对刘宁一客气一些。

元月十六日晚七时，大会开始。王振海主持大会。方圆和杨政与赵秘书在休息室等候周恩来。邵一海、史学忠等人也在场。大约七点半钟，赵秘书和中南海通话后告诉大家，周恩来和刘宁一分乘两辆小车离开了中南海，将在八点差十分左右到达工人体育馆。八点差一刻左右，刘宁一的座车先到。赵秘书问刘宁一，周总理的座车是否在后面？刘说在后面，一两分钟就到。赵秘书带着方圆和杨政，还有近百名卫队在入口处等候周的来临。

寒风中，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赵秘书焦急地一次又一次地看手表。时间已到八点，周的座车仍然未来。八点十分仍然不见周的座驾踪影。

赵等不住了，焦急地去休息室打电话。

不一会，赵自言自语地从休息室出来，他一边走边看手表边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方圆问他究竟怎么啦？他说，中南海说总理已经来了，怎么这样久还未到？大概到了八时二十分，周仍未到来，赵秘书已如热锅上的蚂蚁，满头大汗。

这时，一位警卫人员从休息室走来，叫赵秘书和“全红总”的负责人接听电话。赵进入休息室听了电话，脸色大变。他放下电话，悄声对方圆说：“总理途中遇刺。几十个骑摩托车的人向周总理的车子开枪，幸好红旗牌的防弹装甲很厚，马力又大，总理已经安全脱险回到中南海。你必须绝对保密，只能对群众说总理有特别紧急的事要处理，不能参加大会了。你快去请刘宁一书记来，我和他们马上回去。”

方圆听后很吃惊，很沉重。只得去前台把刘宁一请下台来，让刘和赵迅速离开工人体育馆。当天会议结束后，方只将此消息告诉了王振海和杨政二人。

方圆说，当时事有蹊跷之点是：

一、江青等本是这次会议的提议者，会前一口应承要来，当天为什么不来了？

二、邵一海作为中央文革联络员，当天为什么中途失踪？而他失踪的时间正巧和周遇刺的时间如此接近？

三、从这一天后，邵一海就与“全红总”失去了联络，中央文革也不愿接听“全红总”的电话，难道其中没有原因吗？

四、江青的座驾在长安街上也曾被“联动”的一群狂人骑自行车追逐碰撞，为什么周的遇刺如此相似？只不过自行车变成了摩托车？

以上这些疑点均在目前无法澄清。究竟是有人想挑拨周恩来和“全红总”的关系并籍此嫁祸于“全红总”？抑或是周恩来玩了“全红总”一手为今后镇压“全红总”制造理由？还是周的政敌刺杀周选上那天的时辰，周之遇刺与大会无关纯属巧合？

## 九、王振海被劫持

元月十七日，也就是工人体育馆大会后的第二天。首都三司的史学忠、宗祥荣找到王振海和方圆，直接了当地告诉他们：中央希望“全红总”做“抓革命，促生产，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模范”，自动撤销组织，通告全国。

元月十八日，李晋暄提出，她住中央广播局宿舍，是中央下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和冲击的禁区，有解放军把守，她愿保管总部的公章印信和文书档案。当时，大家都认为她的提议很好，一致同意把公章印信和文书档案移送她家。

元月十九日，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赵秘书给方圆打来电话，告知周恩来不允许有全国性组织。赵说：“地方组织可以夺地方上的权，你们全国性的组织是不是要夺中央的权？中央拟在最近就

要下达撤销全国性组织的文件，希望你们自己主动撤销，带头遵守中央的指示。”

元月二十日，国家科委夺权后的新当权派——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张本（女）紧急约见王振海等。她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告诉王振海和方圆：

“周总理要我转告你们，‘全红总’应该主动撤销。因为你们的历史任务已经结束了。你们迎来了工矿企业文化革命的新高潮。这个新高潮目前正在被走资派利用，走资派正在全国范围内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你们应该知道，毛主席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夺权。中央原来叫你们进驻全总，就是叫你们去夺全总的权。但你们进驻全总后集中精力去搞什么‘三家联合通告’，完全没有领悟中央指示的精神。现在夺也不行了。一下子冒出这样多全国性组织，你们夺了全总的权，别的组织夺什么权？夺中央的权？夺国务院的权？想杀头吗？”

她接着说：“所以，中央决定取缔一切全国性组织。至于你们，你们有些功劳。江青首长支持过你们，你们的确有一定的号召力，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总理要我告诉你们，最好有个善始善终。我想，你们是考虑组织撤销后自己怎么办吧？我看不用担心。振海可以回到情报所。如果你认为情报所格局太小，我可以把你提到科委来，作为我的副手，你认为怎么样？”

张本说：“过来吧。不要担心待遇问题。我是行政九级，振海作我的副手不会低到什么地方去。”

王振海客气地拒绝了张本的邀请。

元月二十一日，大约有二三百名首都三司的红卫兵来砸“全红总”，因为看见近千名“前进战斗队”守卫在全总大楼周围，喊几句口号后跑掉了。当天晚上，总部会议决定，为了反击这股指向“全红总”的恶浪，在元月二十二日中午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和示威。

元月二十二日，“全红总”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示威。一面巨大的“全红总”大旗飘扬在金水桥前。王振海主持了大会并作了长篇讲话。当天的主要口号有：

“要革命，要造反。要吃饭，要生产。”

“誓死砸碎一切剥削制度！”

“‘全红总’是革命群众组织！”

“青松不老，红总不倒！”

集会后，近三十万人的队伍从天安门广场游行到复兴门外大街的全国总工会大楼。

当晚近十二时许，郝维奇惊慌慌地跑来王振海和方圆。当时王振海与方圆商量一个大计——准备在元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进驻全国总工会后的一个月，“全红总”撤出全总大楼，搬到广州、上海或长沙，把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斗争坚持下去。

郝维奇送来一份打印的传单。这份传单以“首都三司”的名义印发，内容是陈伯达的“六点指示”。这“六点”的原文记不清了，大意是：

（1）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没有接见任何临时合同工代表。所谓江青支持“全红总”的讲话是伪造的，中央文革正式辟谣。

- (2) 临时合同工制度中的不合理部份，留待运动后期改革。
- (3) “全红总”是非法组织。
- (4) “三家联合通告”是非法文件，应予取消。
- (5) 所有来京的外地工人，必须迅速回到本地区本部门参加那里的夺权斗争。
- (6) 各地的“全红总”分团必须立即解散。

看到这份“六点”后，方圆立即打电话给陈伯达，问他是否作过这“六点指示”？在电话中陈伯达一口否认，并认为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有人在挑拨中央文革和临时合同工的关系。要王振海和方圆立即带着这份传单到中央文革。当时已是元月二十三日凌晨。

王振海和方圆商量后，决定通知李晋暄一起去中央文革。王振海、方圆、杨政三人坐前面一辆“别尔卡”黑色轿车，其他几名“前进战斗队”的队员乘坐一辆“嘎斯”吉普，驶向李晋暄家。

就在通往李晋暄家（广播局宿舍）的一条小街上，后面那辆吉普失去了踪影，一辆大客车横在前面路上。司机鸣号要前面的大客车让路，谁知这辆大客车不但不让路，反而从车上冲下来二三十名戴着白口罩、身着绿军装的人。方圆看情况不妙，立即叫司机掉头。但司机还未掉头，另一辆大客车已横拦在后面路上，同样冲出几十名白口罩、身着绿军装的彪形大汉。

这一前一后几十人迅速包围了王振海等的座驾，强行拉开车门，两三个人挟一人，把王振海等三人强行挟到前面的大客车上，关上门就开走。这时，依靠路灯，可以看见其中这些人戴的袖套上有“国家科委革命造反兵团”字样。车子到了公安部门口停下，几个人进去交涉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出来，看样子公安部不肯收留。

车子又驶向北京市公安局。大约交涉了半小时左右，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公安人员上了车，把王振海、方圆、杨政带进北京市公安局。在进入大厅后，那几个押着王振海、臂带红袖章的人把王振海押进一间房子。

一位戴着眼镜。约四十开外的公安人员在大厅招呼方圆和杨政坐下，致歉说：“让你们受惊了，”他说：“国家科委系统的造反派已查明王振海是混入群众组织的坏人，现揪送到公安局审查。我们不予收留，因为这是他们本系统内的事。现在他们把王振海带走，去向不明。希望你们回去后不要告诉“全红总”的群众，以免造成群众斗群众。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你们要负一切责任。”

他劝告方圆和杨政：“快回家乡去‘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再管北京的事了。否则，会有更大的麻烦。”说了近两小时，他把方圆和杨政送出北京市公安局大门。此时，已是二十三日清晨七点钟。

方圆和杨政出了门，立即找了一个公共电话亭将夜间的事向中央文革和总理办公室报告。接听电话的人都是一个腔调地告诉方圆、杨政二人：中央将迅速去查明情况。在情况不明前，千万不要把王振海被劫持的事告诉群众，以免造成群众斗群众。方圆和杨政还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找到他们的负责人。他们的负责人和戚本禹通话后，说戚本禹听后很生气，中央文革将立即派专人清查。

方圆和杨政回到全总大楼时，已近中午时分。只见全总大楼内内外外都贴满了大标语，内容是：“王振海反对党中央已被逮捕法办！”“坚决砸烂反动组织全红总！”

这时，“全红总”正在毛胜年、余云庆主持下开紧急会议。总部紧急会议作了如下决议：

- 一、以杨政、郝维奇为首成立王振海事件调查小组负责营救王振海的工作。
- 二、通知北京分团，每隔八小时派一个纵队来总部轮流值班，协助总部卫队保卫总部。
- 三、一旦有人来砸总部，力争做到骂不回口，打不还手，做好说明解释的工作。
- 四、责成李晋晔立即去中央文革向江青报告，希望中央文革向公安部查清王振海的去向。
- 五、由方圆拟定《告全国人民书》，以备出现紧急状况时散发。
- 六、通知金展云和李敦白，随时准备在全总会议厅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

## 十、“一二三事件”

元月二十三日晚七点左右，一批打着首都三司、二司、一司等等旗号的红卫兵包围了全总大楼。他们手持棍棒，也有少数人拿着汽枪、猎枪、小口径步枪等形形色色的武器。这时，听到总部被围，北京分团部份团员从各方赶来，把这近万名红卫兵反包围。

十点左右，几十辆卡车运着更多的红卫兵来到全总大楼下，把反包围红卫兵的北京分团再反包围。

到了近十二点钟，“全红总”各路增援群众赶到，又把第三批红卫兵围个水泄不通。这时，外面人声沸腾，如一锅烧开的开水。到了深夜一点多钟，双方开始扔石头砖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方圆等多次打电话给中央文革、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希望他们出面劝导学生撤走。

到了三点左右，红卫兵开始用汽枪、猎枪、小口径步枪（也有可能用手枪）向全总大楼射击，“全红总”群众受伤人数已近百人。方圆看局势发展如此，向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告诉他们如不在一小时内叫红卫兵撤走，任何人都无法控制局面。

约半小时后，几辆黑色小车从广播局方向开来，居然把这些疯狂的红卫兵叫走了。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得以制止。

## 十一、方圆临危受命

元月二十四日下午，“全红总”总部委员们，顾不得一夜的紧张和疲劳，召开了王振海被劫持后的第一次总部会议。会议首先讨论了如何应变。大家都认为，劫持王振海后立即来砸“全红总”，是希望在“蛇无头不行”情况下一举铲除“全红总”。现在目的没有达到，对方决不会就此罢手。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主动撤掉组织，逃回家乡寻找安全，但难保当局不会秋后算账。二是硬顶下去，大家都要作好坐牢杀头的准备。但只有这样才能为临时合同工争到权益和尊严。就是失败了，也可以唤起广大工人的觉醒。

因此，大家决定作一次无记名投票，在这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投票结果，与会的五十六名总部委员中五十五名选择坚持下去，一名选择撤销总部。

紧接着，大家提出应立即推选一人接替王振海主持大局。经过选举，五十二票推选方圆出任“五人小组”（此时只有四人）负责人；四十八票推选杨政增补为五人小组成员，仍兼任保卫部长，其余成员职务不动。会议作出以下决议：

- 一、二月一日撤出全国总工会大楼。发表声明，说明“全红总”总部将迁往广州。
- 二、杨政、余云庆、廖日海、周泉四人在二月二日前飞到广州做好总部搬迁的准备工作。

三、总部搬迁至广州后，北京建立“全红总”驻京联络站，地址设在冶金部第二招待所。

四、通知“全红总”西南区指挥部负责人李伯特在云、贵、川三省物色一处条件具备的地点建立基地。

五、北京分团二月一日撤出劳动部，迁往石景山钢铁厂。

六、郝维奇立即和各全国性组织和外地驻京联络站联系，召开一次全国性组织座谈会，建立全国性组织革命造反统一战线。

元月二十九日，方圆等将拟好的声明送李晋暄家，请她打印和盖上公章。

元月三十日下午，李晋暄将打印好的声明送到总部。一看此声明，大家大吃一惊。

李晋暄拟的这份声明竟然是宣布“全红总”在二月一日自动解散，临时合同工制度留待运动后期改革。大家问她为何不经大家同意作出这种根本性的修改？

李说：“告诉你们实话吧，你们不同意这种修改，我立即退出‘全红总’。公章和档案我早就交给中央文革了。不信你们自己去问。”

十二天后，也就是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勒令所有全国性组织一律撤销。针对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这一通告，“全红总”发出《二告全国人民书》质问：为什么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学联、全国青联、全国工商联这些“全国性组织”有权存在，我们的全国性组织却要勒令撤销？公理何在？宪法何在？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文革期间对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处理问题的通告》。全文如下：

（一）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的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以取消。各省市劳动局根据“三团体”的联合通告所决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废。

（二）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中央正在研究，准备分别情况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进行。

（三）各企业、各单位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应和正式的职工、工作人员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有权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对领导上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应当平反。因此而被解雇的，应当回到原生产单位，按原合同办事，克扣的工资应当补发。

（五）要把混入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假冒组织名义招摇撞骗者，必须坚决揭露。

（六）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以及各地的分团应当取消。参加这个组织的革命群众，可参加本企业、本单位、本地方的革命群众组织。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 十二、最后的挣扎

中共的这个文件发出后，尚未离京的“全红总”总部委员约三十多人开了“全红总”最后一次总部会议。“五人小组”成员方圆、金展云、郝维奇一起主持了这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决定，搬迁到广州的全国总部鉴于中共公开取缔“全红总”，立即改名为“改革临时工合同工制度联络总站”。分团各自更改组织的名称，进一步整顿基层，等待有利时机。各分团改名后，可参加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保障组织不散。会议最后决定印发《三告全国人民书》，大家尽快离京，六七年“五一”劳动节在广州汇合。

会议结束后，外地赴京的“全红总”成员先后离去。方圆和毛胜年等待所有总部成员安全转移后，在二月二十二日取道上海南下，二十六日回到贵阳。

三月二日，方圆和毛胜年在贵阳看见了以牟立善为主任的北京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布告”。在这份布告上，数十个群众组织被打成“反动组织”，其中赫赫头一名的就是“全红总”。

三月三日晚，李伯特一行回到贵阳。听方圆和毛胜年已回来，立即深夜赶到方圆家。李伯特告诉方圆，他们已在云南红河地区建立了安全基地，早已买好次日凌晨到昆明的火车票，要方圆和他们马上去毛胜年家叫毛胜年立即动身。

大家正准备出发时，一群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了方圆住宅。当晚，方圆、李伯特、毛胜年、杨爽秋（女）等被拘留。次日，“全红总”贵州分部的主要负责人潘汉发、邬光顺、廖蓉花（女）、王秉忠等数十人和总部成员张德明、余洪珠（女）等均被关押。

此时，全国各地的“全红总”各级负责人大都被捕。在所有被判刑的“全红总”领袖中，方圆被判得最重——被判刑二十年。毛胜年被判刑十五年，石应宽被判刑十五年，李伯特被判刑十年，杨政被判刑七年，欧阳林被判刑七年，王振海被判刑五年。

“全红总”的最后挣扎终告失败。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吕青（加拿大）     | 熊波（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             |          |

---